

作家访谈

我写这样的父亲，是写别人的父亲，也是写我的父亲。他们在那个时代里载浮载沉，也在那个时代里与我们渐行渐远。

邵丽：想把父亲从“天台”上找回来

■本报记者 舒晋瑜

“刚刚过去的事情既像一个伤口，更像是到处游走的内伤，无从安抚。”用《天台上的父亲》中这句话概括阅读后的感受也比较确切。

著名作家邵丽的最新中短篇小说集《天台上的父亲》，收入《天台上的父亲》《风中的母亲》《北去的河》《黄河故事》等共十篇。《天台上的父亲》始终牢牢地聚焦于父亲的自杀事件，写出了仕场生涯对一个男性的深刻异化以及为他的家庭成员带来的磨难。《风中的母亲》塑造了一个在乡村的城市化进程中与中国勤劳智慧的传统女性完全不同的第一代“新”老人。《黄河故事》细致书写了一个对食物和做饭有狂热梦想的父亲，勾勒出了那一辈人特殊年代里的生活状态……在这些作品中，作者回望父亲，塑造出个性鲜明而又不同以往的“父亲”和“母亲”形象，并以此为坐标勾连起家庭往事，将人物命运置于历史洪流之中加以展现。

结束之后邵丽又细细看了一遍，感觉大吃一惊。她说，虽然这是一个中短篇小说集，但仔细算算年头可不算短了，像《北去的河》《亲爱的，好好的雪》《树上的家》等，已经都是好几年前的作品。现在再回头看这些作品，仿佛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那些故事是怎么来的？我又是怎么捕捉到它们的？也许这也是小说的真谛，与其说它是一个故事，毋宁说它是一种情绪，一种世道。当我细细地打量着这些作品的时候，我真懂得了自己做过什么，以及，今后将如何做。”

中华读书报：《天台上的父亲》

中的父亲形象是独特的，同时也是立体的。他被权力伤害过，也喜欢权力。塑造这样的人物，您的切入点是什么？

邵丽：与其说父亲是权力的象征，不如说他是权力的奴役。他已经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他被权力绑架，又十分依附权力。失去权力于他而言就是失去了生命的支撑，所以他的活与死只是形式上，而不是实质上的。从脱离开权力的那一天，他就成为一具僵尸游魂，他不上天台，死或者活着，已经没有了生活上的意义。

我写这样的父亲，是写别人的父亲，也是写我的父亲。他们在那个时代里载浮载沉，也在那个时代里与我们渐行渐远。

中华读书报：小说中的“父亲”隔膜又熟悉。多数传统家庭中的父亲不太容易让人亲近，是“天台”上的父亲。父亲自杀了，“我”和哥哥妹妹才逐渐接近父亲，了解父亲，在母亲的讲述里，在父亲的记录里。走近父亲，把父亲从“天台”上找回来，是您的一种理想或向往吗？

邵丽：这是一个好问题，也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同时更是我最近一直思考的问题。其实就中国而言，父权是传统文化的中心。但就问题的本质而言，父亲既是真实存在的，又是极具象征性的。因为他的权威过于程式化，实际上反而被虚置了。说起来父亲是权力的化身，或者是权力本身。但在一个家庭的实际生活中，真正组织和管理家庭的基本上都是母亲。所以，一方面父亲无处不在，另外一方面，父亲永远都是缺失的。但父亲

对子女的影响也是不能忽略不计的，如果说母亲决定你做人方式的话，父亲决定你的格局和视野；母亲决定你怎么走，父亲决定你能走多远。

非常悲哀的是，我们认识父亲往往都是从他死后开始的。我写这篇小说的目的，的确是想要把父亲从“天台”上找回来。

中华读书报：《天台上的父亲》中的父亲和哥哥都有抑郁症。现代人的精神疾病越来越多，您写作之前是否对抑郁症有些了解，还是只作为一种叙述背景？

邵丽：毋庸讳言，一个高度发达的时代给人类带来各种方便，同时也带来焦虑和不安，甚至我自己都有抑郁症，而且很多年了。但是对这个病症的了解还真说不上，我觉得这是一个最无厘头的病。

中华读书报：很喜欢《大河》，一口气读完。小说中的婆婆，婆媳间既亲密又疏离的复杂感情，描写得特别细腻。亲密是在一瞬间，疏离也是在一瞬间。得知丈夫有外遇后，“我”的痛苦与婆婆的态度让人感慨。情感困境也很普遍，似乎是不同时代的女人都无法逃脱的命运。这篇小说的创作过程是怎样的状态？

邵丽：我写得确实畅快，也很痛快。很久以来，我一直想写写我的婆婆，其间也写了不少有关她的文章，都是零零散散的，不成体系。她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女人，活到九十岁，她活这么大年龄完全是因为她有生的欲望。我一直靠近生活，与世俗打成一片，而

且与时俱进。用新潮的手机，穿时尚的衣服，喜欢住在热闹的地方，天天逛街花钱。七十岁开始识字写字，而且一发不可收。每天看完《今日说法》后都要写一篇观后感，她自己说那叫评论。去世的时候，她写的评论堆起来比她的个子还高。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任何一个情况下，她都知道自己是谁，以及怎么安置自己。她活得没有大过，也没有小过，刚刚是自己需要的大小。这是一个人，尤其是女人的自尊和尊严之所在。她是一个真正大智慧的女人。

中华读书报：《大河》中处处充满生活的哲理。比如婆婆劝儿媳“有些事不能装傻，有些事就得装傻，这才是明白人。”比如朋友林鸣说：“做什么事好像总是有人在后面逼着，身不由己。”这种哲理是一直存在于您的小说里吗？

邵丽：关于这些生活的哲理，是我在下派挂职锻炼之后才刻意注意的。从《村北的玉庭柱》到《挂职笔记》，都在刻意张扬这种民间智慧。它未必合理，但是有用。

中华读书报：近几年，您的小说涉及家族、关乎父母亲的故事特别多，《天台上的父亲》《黄河故事》《风中的母亲》《金枝》，涵盖了长中短篇小说体裁。为什么您如此热衷于写父亲？

邵丽：写父亲主要是想写我的家族，把父亲的历史讲清楚了，我的家族历史也就梳理得差不多了。对于我的家族，我一直都有“触碰”的愿望，而且这种欲望随着对我的家族逐步深入了解，越来越强烈。写

父亲，让我重新回到了家族之中，不仅仅是历史之中，也是情感之中，命运之中。我觉得我又重新活了一次，而且活得特别清醒和纯粹。

中华读书报：评论家程德培注意到，邵丽的小说擅长家庭婚姻的叙事伦理，最近以来更强调代际之间的情感纠葛及个人的教育成长的影响——您认同吗？如果认同，能否谈谈您创作以来小说的风格变化？这一变化是基于什么？

邵丽：如果说一定要给我的小说创作分阶段的话，我觉得大体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个是我刚刚进入作家队伍的时候，喜欢写那些虚无缥缈的小情小感，离真实的生活很远，以《迷离》和《寂寞的汤姆》为代表。第二个阶段是在我挂职锻炼之后，就是评论家们所谓的“挂职系列”小说，离现实非常近，以《刘万福案件》和《第四十圈》为代表。第三个阶段是父亲去世之后，我对家族历史的梳理，以《糖果》和《金枝》为代表。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你在多大程度上接近和反思你的历史和现实，接受生活对你的最终安排。

中华读书报：或跳河，或跳楼，在您的小说中，父亲的结局多非正常死亡。这有什么隐喻吗？

邵丽：没错，在《天台上的父亲》与《黄河故事》里，看起来最终是两个父亲都死了，而且都是死于现实的不可调和，但这两个父亲其实是有着很大的差异的。《天台上的父亲》里的父亲因为离开权力体系之后有一种失落感，他已经找不到生



《天台上的父亲》，邵丽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年9月第一版，59.00元

活的目的和方向。他已经被格式化，不能重新回到社会中过普通人的日子了。所以他除了死，没有任何人或者任何办法可以化解开他心中的忧郁。而《黄河故事》里的父亲，从来没有走到过他想去的地方，他一生的梦想就是做一个好厨子。但在那种逼仄的环境里，他的梦想看起来既可笑又可悲。他一生唯一的一次绽放，就是当三轮车夫给人送菜的时候，在路边一个小饭店死乞白赖地当了一次大厨。那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饭店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所以，他的死看起来最令人伤悲，他是一个真正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

至于说到隐喻，我觉得至少这两起死亡不是偶然的，它有着质的规定性和执着的方向，而决定这一切的，除了环境之外，也有一个人的取舍问题，即“性格决定命运。”

中华读书报：故事讲述的是小人物，琐碎平凡却真实可信，背景却是时代风云，城乡变迁，以开闸的大手讲述这细腻的中国故事，引人入胜。地域是否一直隐秘地折射在您的故事中？

邵丽：尽管我的故事有着很强的地域性，但是我确实没有刻意思考过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我写的父亲既是“这一个”，也是“那一个”。

名家荐书

书画家别集受到追捧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内容隽永，文字形象，绝无诘屈聱牙之感。而我有幸拜读朱万章先生的这部专著，正是这种感受。

书画家的书话

大约从晚清开始，书画家的别集受到藏家追捧，一直到现在仍然如此，除了个别品种外，绝大多数书画家的集子都高于同时代相类之本，就这个问题，我曾经向杨成凯先生请教过，他认为有三个原因，一是这类集子本来流传就不多，物以稀为贵；二是因为书画作品的价值，使得画家之名广为所知；三者此类书大多都刊刻得颇为漂亮，而漂亮的東西总是受人喜爱，何况书中俊物。

流传稀见与版刻之美，二难并于一者，可以金农所刻《冬心先生集》为例。此书的字体迥异他本，以往有说说法是金农手书，后知并非如此，但不影响人们对该书追捧。当年冬心先生曾用朱砂印刷该书，三十年来，我仅见过一部朱砂印刷之本，惜被大力者夺去，转售日人，每念及此，为之叹惜再三。那部书无论研究重点，而这些都是清人别集中的白眉，如果市面上再出现一部，尽管是浅黄小册，估计价值逾百万不办。

以我的私见，书画家别集受到

追捧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内容隽永，文字形象，绝无诘屈聱牙之感。而我有幸提前拜读朱万章先生的这部专著，正是这种感受。

我与朱先生未曾谋面，但拜读过他多部大作，知其能书善画，且在书画理论方面颇有建树。我在写《觅画记》时，搜集文献，多次读到孙先生的论文，了解到他以往的研究重点是岭南画派，后来推广到多个画域，其所作之文均寓言之有物，而他本人又是画家，如此说来，他的这部《嘉瓠楼书话》正是书画家别集。

朱先生的这部文集分为四卷。第一卷乃是读书札记，这部分的主题是朱先生为别人著述所写的序言，当然这些书主要是与画史有关。第二卷的主题是朱先生为其自著书所写的后记，比如有《岭南金石书法论从》《六朋画事》《岭南书法》《广东绘画》等书的后记，由此可窥得他早期的研究重点，而这些都是对他对某个画派，或某个画家研究成果的总结。卷三则为题画录，就本书而言，这部分最具可读性，每则题目都很抓人眼球，比如《吾自洗

吾心》《君问奇书我访碑》。卷四则为书籍题记，实乃书跋，就内容而言，这部分最对我的胃口。读其文字，感觉这些书跋乃是转录自朱先生的自藏之本，因为所见文稿未附图片，我不清楚朱先生是将这些文字写在了书的前扉页上，还是书的卷尾。但是，这让我想到了孙犁的《书衣文集》，孙先生是写在包好的书皮上，不知朱先生是否有类似的习惯，不过，他所写之文跟《书衣文集》同样的隽永。

朱先生的每则书跋几乎都谈到了得书时间与地点，有时还会标出购书价格，重点写到读书感悟，同时录出他在书上的自题印。将书跋转录入书稿时，文末会标出原书的作者、出版社、版别、版次，其文体结构颇有黄裳《黄裳先生之书跋》之髓。

黄裳先生藏书有多个专题，清人别集乃是他的藏书的重点之一。三十年前，他在齐鲁书社出版了《清代版刻一隅》，该书的出版使得风向一向不高的清刻本大幅提升，而后他又出版了一系列书话集，比如《来燕榭读书记》等等，这些书成

了许多爱书人的购书指南，有些人在写书话时，就会谈到所得的哪部书曾被黄裳先生提到过。我从本书中感受到，朱先生也喜好黄裳的作品，文章中谈到多部黄裳的著作，比如《故人书简》《黄裳致李辉信札》《榆下说书》《榆下夕拾》等等，想来朱先生也有藏书之好，否则他不会关注书话类之书，比如《叶德辉书话》，如果不是同道者，恐怕少有人会谈这样的书。

朱先生在此则书话中认为，叶德辉书话乃是“藏书家经验之谈”，虽然如此，但他还是会将其与其专业相比，故其认为叶德辉的书跋“一如书画之鉴与藏”，他还关注叶德辉在书跋中谈到的书法与名画，这真可谓心有爱好，笔墨及之。所以他认为叶氏“藏书实与藏书画同乐矣”。

与书画相较，朱先生的题画录文笔更为灵动，每则题画录均为先录前人画作中的题诗诗文，而后对此发条评论，每则题目都是朱先生对此个问题的总结，可称之为“画题之眼”。同样因为未能看到配图，不请

楚这些画录是朱先生书写在画作的拖尾上，抑或只是他记在笔记本上的文字。但我从中体悟到他对一些问题看法，例如《有笔有气》一则，他先是摘录了清人蒋骥在《读画纪闻》中的所言，然后称：“深夜诵之，颇合吾意。”可见他是以以前人之语，洗自家胸中块垒。然其在文尾写到“久未捉笔，研墨试纸”云云，可见他确实用墨笔书之，只是未注明书于何处。

朱先生的画录题材丰富，比如有一则名为《全国美展》，显然不会有同名的这样一张画，他在此文中引用了苏轼所言：“论画讲形似，见与儿童邻”，而后提到第十二届全国美展时，有些国画作品装饰性与工整性充斥其间，这与中国画精神渐行渐远，同时他代东坡居士感慨之，虽然古人说过笔墨当随时代，但徒具其形而忽略精神内核，其笔墨也徒具其形而已。可见朱先生乃性情中人，其在画录中流露出的叹世忧时，正是人文精神所在。

朱先生虽然以画论当行，然从其中文，我仍能感受到他的书之爱，

■韦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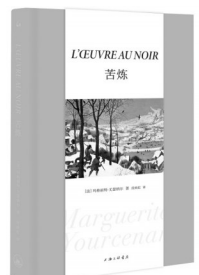


《嘉瓠楼书话》，朱万章著，北京出版社2021年6月第一版，88.00元

比如《读书日课》一篇，专谈书生搬家，飞鸿雪泥，人所难免，歇后语曰“孔夫子搬家——尽书（输）”。书之累，局外人难以体会，但人生在世，总要能苦中作乐，虽然分类入箱，再分检上架，劳动量之大超乎想象，但是在上架之时，无意间翻得一本未见之书，有如他乡遇故知，外行人又怎能体会到这其中之妙呢。

通过阅读此书，让我了解到朱先生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他将自己的直言形诸笔端，这些文字也最能打动我。而他对于一些文字的梳理，虽然是只言片语，却星星点点，直达要害。想来每个人读到这本书，都会有不同的感受，我只是拉杂聊几句自己的体悟罢了。

本版推荐



《苦炼》，[法]玛格丽特·尤瑟纳尔著，段映虹译，上海三联书店2021年10月第一版，68.00元

《苦炼》书名取自欧洲中世纪炼金术的一个术语，指的是将物质放在坩埚中进行煅烧和分离，以提炼出纯粹成分的过程。小说主人公泽农身兼医生、哲学家、炼金术士几重身份，无论对世界还是对人自身的认识，都不甘心接受任何现成的观念。他不惜冒着生命危险，用毕生的观察、实践和思考来努力获得接近于真理的知识。泽农一生的上下求索，浓缩了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时期几代人文主义者对知识和人性的探求，在这个意义上，泽农之死也是一曲文艺复兴终结的挽歌。玛格丽特·尤瑟纳尔是一位典型的学者型作家，深受自古希腊罗马以来的欧洲人文主义传统浸润，《苦炼》从酝酿到成书历时四十余年。



《大山里的音乐会——共产党员邓小岚的故事》，翟英琴著，河北大学出版社2021年8月第一版，28.00元

发现美，在艰难困境中找到光；而对孩子们来说，成长就是逐渐实现人生态度的改变，不断获得坚韧、豁达、宽广的视野和心胸。

但令我不安的是，作品同时呈现了教育的地区差异问题，尽管呈现方式是美好光明的。走出大山的孩子该如何面对与生俱来的教育资源不均衡、不平等的问题？邓小岚老师的个人牺牲与无私奉献是可敬的，但大山里的美育恐怕还要依赖更长加长期化、制度化的教育投入。这可能也恰恰是邓小岚老师不仅带孩子们看到世界，也要让世界看到木兰的目的所在，也是翟英琴这部作品更深刻的社会意义之所在。

邓小岚教给孩子们的恰恰就是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发现美，在艰难困境中找到光。

山村孩子的音乐世界

■吴媛

翟英琴的《大山里的音乐会——共产党员邓小岚的故事》显然属于党员模范人物主题创作之类，但她创造性地选择一个孩子的视角切入主题，将邓小岚扎根平山山村的事迹与孩子在音乐中的个人成长过程交汇在一起，以故事的形式生动呈现了邓小岚带山村、带给孩子们的改变，讴歌了一位老共产党员无私奉献的党性和对老区人民的一片赤诚，对主题创作书写进行了非常有趣而有益的探索。

作品中一个极为生动且富含童趣的细节就是王小乐的“变来变去”。作品开篇就浓墨重彩地渲染了王小乐对于跟着邓老师学吉他有多么向往，为此他抢先报名，报名不成又篡改登记表，还跟邓老师签订了“君子协定”，终于拿到了那把最漂亮的橘红色吉他。但是在初次练琴遇到困难后，王小乐马上产生了畏难情绪，从一心学吉他改成想学手风琴；而在看到北京来的阿里老师弹奏橘红色吉他后，他再次决定学吉他，而且作者特意翻透了一句“从那日起，王小乐抱着吉他再也不敢放下了”。这种“选择”集

虑固然可以理解为王小乐的“没长性”，不肯下苦功夫坚持，但也折射出孩子对这个世界的新鲜感和强烈的探索欲望。值得一提的是，翟英琴充分注意到了在这个过程中邓小岚的态度。邓老师从没有指责王小乐，而是认真对待他的每一次选择，接受他的每一次尝试和改变，只是在王小乐做选择时加以适当的引导，体现出对孩子个体性和主体性的充分尊重。

对于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来说，生活向他们展示出并不那么美好的一面。王小乐虽然被塑造成一个顽皮快乐的男孩，但从文中可以看出他其实是一个父母不在身边的留守儿童，后来奶奶还瘫痪在床，需要他照顾。但儿童的天性中并没有“苦难”的概念，他们是可以把苦难游戏化的。王小乐欺负女同学，在课堂上调皮捣蛋都未尝不是他对抗生活境遇的一种方式。对于尚处于懵懂中的儿童来说，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人生中的艰难困苦，当然也同样没有意识到生活中的美与善。

邓小岚长期扎根山村，带领孩

子们学习音乐，组建小乐队，积极参与到孩子们的成长过程中，就是要以音乐特有的方式，把孩子们从懵懂日常生活中带入审美领域。她和他们一起重新发现身边的铁贯山、胭脂河，和他们一起歌唱身边的生活，演奏他们的心情，让“音乐从身体里流出”。

邓小岚带孩子们唱《故乡的路》：“美丽的家园，故乡马兰，铁贯山高高，胭脂河水潺潺……”铁贯山、胭脂河，尽管日日在这些孩子们眼前，却并没有真正看进他们眼中。这些孩子们一出生，山水就在他们周围，对他们来说，这是可以拾柴禾、挖野菜、找药材的地方，是可以游泳、捞鱼、打水漂的地方，但从来都不是风景。我们的乡土书写经常会面对这个问题，长年在田间劳作的农民看待乡土时，眼中没有风景。只有当他们离开故土，回望家乡时，山川河流、麦稻桑麻才会成为审美对象，成为游子眼中的风景。邓小岚是曾经生活在马兰村又回到马兰村的人，她眼里心里都是风景。山村的孩子很可能都会像父亲

们一样，一直在大山里埋头劳作，但邓小岚希望他们有另一种眼光和视野，一种由音乐赋予的审美眼光。她和她的音乐让孩子们能够更早地发现美，感受美，热爱美。这种审美能力塑造是比单纯的知识传授更高级的启蒙，是对孩子们的人生观、价值观的深度陶冶。邓小岚和大山里的孩子们一起，创造了一个充满音乐、充满快乐的世界，儿童的内在生命力在这个小环境中得到自由舒展、释放，体现出对自由与美的不懈追求。

邓小岚的行为本身就是充满美和诗意的，尽管其中不乏艰难困苦。翟英琴在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也巧妙地把握了儿童世界的轻快与现实世界的沉重做了暗暗处理，使得全书始终充满明亮的色彩和快乐的语调。儿童世界在全书的明处，以王小乐的个人成长为主线，贯通起邓小岚扎根马兰村的一系列故事；现实世界则在叙述的另一面，作者并没有忽略它们的真实存在。艰难困苦可能在任何环境任何时候都会存在，邓小岚给孩子们